博物馆理念的经验与实证
——王宏钧访谈录*

The Experience and Demonstration of Museum Concept: Interview with Wang Hongjun

受访嘉宾：王宏钧[1] 访谈者：潘守永[2] 覃琛[3] 王思怡[2]

Interviewee: Wang Hongjun[1] Interviewer: Pan Shouyong[2] Qin Chen[3] Wang Siyi[2]

（1. 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100010；2.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上海，200444；
3. 中国体育博物馆，北京，100029）

（1.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100010; 2.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form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3. China Sports Museum, Beijing, 100029）

内容提要：王宏钧先生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主编。此次访谈主要以王宏钧先生的“个人学术背景与研究履历”为主线，内容涉及《中国博物馆学基础》的创作与修订、博物馆学的定位与研究特点、博物馆工作的经验与实证等方面。最后，王宏钧先生基于国际博物馆协会新章程的颁布，展望博物馆学的未来发展，以期在实证主义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进一步探讨中国博物馆学的理论研究和思考。

关键词：《中国博物馆学基础》 博物馆学 经验与实证

Abstract: Wang Hongjun used to be the secretary of CPC in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and the editor in chief of *The Basis of Chinese Museology*. This interview mainly takes Mr. Wang’s personal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resume as the main line, and involves the creation and revision of *The Basis of Chinese Museology*, the positioning and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museology, the experience and demonstration of museum work, etc. Finally, based on *ICOM Statutes* approved in Vienna (Austria), Mr. Wang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useology,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hinking of Chinese museology under the guidance of positivist theories and methods.

Key Words: *The Basis of Chinese Museology*; museology; experience and demonstration

* 王宏钧，研究员，1926年1月22日出生，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毕业。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副馆长，中国博物馆学会代理事长，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亚太地区委员会委员，中国明史学会顾问，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清史卷》副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部分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博物馆学部分主编。现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成员、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中国文物学会顾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顾问。

一、新旧变革　思想碰撞

在我们人类学理论里面，有一个“个人生命史”的访谈方法，首先谈一下个人的一些人生经历，在传统的访谈里，一般不涉及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想先请您讲讲您的早年经历。

我生于1926年初，原籍是安徽泾县，就是皖南。那时中国还处于新旧变革比较剧烈的时期——北洋政府时代。1931年秋，我在北京上小学，我进小学后的两个星期，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到了1937年，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占了北京，当年我11岁。我上完小学之后，考进了北京四中。中学时期，大多数同学偏重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也认真学数理化。但是，我对历史、政治的兴趣更大。最后我报考了政治学系，学政治经济学。

您大学的时候，思想比较活跃，听说您在大学一年级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谈谈您的大学学习生活吗？

我是在大学一年级暑假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抱负就是，能够参加挽救中国的运动。之后我转学到了清华。在抗日战争中，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了一些工作，主要是做社会刊物《学生群刊》。在1945年12月，参加学校里的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关押，后来在学校、地下党的营救下获释。1946年4月，我第一次进入解放区，到晋察冀边区的首府张家口，在那里参加学习，也见到一些领导，他们给我们做报告，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1946年的12月底，沈崇事件引发了第一次反美运动，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了这次运动。转到来年，内战也爆发了。当时，学习环境就很不稳定。学校里，好多先生的思想都是很进步的，他们也支持学生运动，当然也有不支持的，但是进步的老师占大多数。像吴晗、费孝通这样的老师，清华是很多的。我当时学的是政治学系的课，但也可以去听其他专业的课。我那时候对各种社会思想很感兴趣，听过潘光旦的世界社会思想史，当时他是社会学系主任，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思想史。当时听得多的是张奚若的课程，张奚若讲西方政治思想史。还有中国政治思想史，当时这个课没开出来，就由冯友兰讲解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相关内容。后来冯先生到美国访学一年，该课程就由张岱年来代讲。当时我读到了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历史主要是吴晗先生在讲，还有一些知名的老教授。但是当时我们注意的是新史学，翦伯赞的《中国史纲》是主要的参考书。费孝通开的科目是农村社会学，以他的江村调查为基础来讲。

1948年底的时候，形势变化，我那时也离开学校了，参加了华北军区野战部队第十七旅，它的政治部在北京。后来转业，被分配到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以下简称文化部）。

所以这些训练对您后来参与策划“中国通史陈列”帮助也挺大的？我们感觉您做的大多不是具体历史考证的研究，而是构建比较宏观的历史叙事。

对，我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和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大致说来我主要从事明清史和博物馆学的研究，我在明清历史中更关注城市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农民战争、边疆史地等方面，对这些领域的研究也会从一般社会科学的角度提出问题和思考。

1949年，文化部刚成立，我在其下属的单位文物局做文物保护、图书馆管理工作，也关注一些博物馆的工作。1951年10月27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指示：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地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并且进一步强调，“博物馆事业仍应以改造原有的为主，仅在个别有条件地区得筹建新的博物馆”。1952年以后，按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方针，改造旧的文化事业，有步骤地慎重地开展了博物馆改造工作。当时我在文化部做秘书，

业务秘书要深入了解业务情况。参与最多的是文化部大型调查研究，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是1952年的夏天到秋天，我们文物局有个小组，到华东区[①]去考察。这次考察中学习了好多，看了许多博物馆，如山东省的一些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以及教会在上海兴建的和国民政府在此处遗留的博物馆等。看到一个博物馆是怎么样建立的，博物馆的机构和建制如何设置，历史类的展览陈列如何搞，一个一个去了解。1953年，我们又组织了一次中南区的调查。1954年春节期间又做了一次文化活动的调查，当时关于博物馆的书还没有。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博物馆的工作仍然在文物局。

您是最早参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建的一批人吧？

1958年我被下放，下放回来后，适逢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修建中国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历博）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以下简称革博）新馆[②]，我那时就调到了历博。我从事博物馆的工作也是从那时开始的。我经历了历博的建馆过程，也做了比较深入的学习。我先在文物组工作，主要负责文物征集和管理，后来在联合办公室工作，参与了整个建馆过程中一次次大规模的讨论会，听到许多高见。在“中国通史陈列”的筹备中，我也参与了一些关于陈列大纲的讨论。当时的情况是：中央大力支持历博和革博的建立，调集了全国各大高校和研究部门的专家，有来自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许多单位的知名学者。当时讲中国史，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范本，主要用新的历史观来讲中国历史，这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一些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像翦伯赞、吴晗、邓拓、侯外庐、邓广铭，以及考古学家夏鼐等，都参与了这些讨论。我当时边听边重新学习历史。最后陈列方案出来，已经是讨论出的第九稿。我的主要工作是布置陈列，负责明清史这一段。1960年，我到了陈列部担任内容研究设计组组长。这个组很大，陈列结构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单元，包含史前、夏商周至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简称六朝）、隋唐、宋元和明清，共计八个段，每个段对应一个小组。组中大部分的人是1958年、1959年大学毕业的同学，以历史学、考古学专业为主，有少量的、早来的1956年、1957年毕业的同学。有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的，大家一起学习来讨论。陈列开放以后，一方面展览，一方面听大家的意见，然后进行修改。我们的工作就是，每年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1963年开始，我就轮番地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和农村的四清。1969年，历博和革博合并，我个人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去参加劳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我担任了研究室主任。在我的建议下，1979年创办了《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83年，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建制[1]，我们有三个同志参加了馆的领导工作。一个是胡德平，一个是沈庆林，另外一个就是我。当时成立一个恢复建制的领导小组，我做组长，沈庆林做副组长。当时我们让历博和革博各成立三个工作小组，共同商量人员怎么分、建筑怎么分、财务怎么分，两边再合成一个小组，商量出一个方案后，经领导小组讨论同意，上报国家文物局，上面批回来，就按照这个方案执行了，再有意见以后再说。此后，我又做了几年历博的党委书记。那时候连故宫博物院也没有任命院长，我是以党委书记、副馆长的身份来主持历博的工作。

我们看历博的历年大事记时发现，馆长职位长期处于空缺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呢？

① 华东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划分了六大一级行政区，于1954年撤销。华东区包括现在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台湾等地。江西先属中南区，后划归华东区。

② 新馆建成初期定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与中央革命博物馆，1960年8月分别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

故宫、革博、历博这三大馆，过去的级别很高，包括馆长、副馆长都是由国务院直接任命和下聘书，签章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想找德高望重的人担任馆长，但是找不着，找到了几个又觉得不合适，想让我们做，又觉得好像还不够分量。怎么办呢，只能由我们，也就是党委书记兼第一副馆长来主持工作。有的单位党委书记不兼任副馆长，不是一个人兼任。故宫、革博、历博就是这个情况。我是1982年担任历博领导工作的，1983年开始直接负责，到1987年离休，退到二线了。离休以后，馆里又继续延聘，主要是还要继续修改陈列，我就作为陈列总体组的顾问，参与陈列修改的讨论。我离休以后也一直在馆里从事研究，学术工作没有停止，被返聘为学术委员会委员。

二、心怀天下　研究经验谈

您在历博工作三十多年，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您对做学问有什么心得呢？

我自己所做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的研究。因为这个和我过去所学接近一点。到了历博以后，我的一个研究原则是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做深入研究。因为我是通史陈列内容设计组的组长，虽然我个人主要承担的是明清历史这一段的陈列内容，可是我也得学“通史”，至少大的通史脉络我得了解，要不然无法承担工作。历史脉络弄清楚了，要想想拿什么表现，哪件文物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博物馆，历史的研究必须与文物结合。而且还不止这两样，还有一个是博物馆学的研究，你毕竟不能把它（文物）搁这儿就完事了，怎么组合它才好呢，如何写说明文字呢，等等，这就需要博物馆学的知识。博物馆学研究也是我个人学术研究的另一方面。

博物馆学知识，特别是陈列，第一应该有文物知识。从文物拣选、征集，到进库房，都需要文物知识。进了库房首先得看目录，看看博物馆都有些什么东西，从原始社会到清代，你都得逐步熟悉。而且有些学术期刊，你也得看：了解新出土有些什么文物，它反映什么问题，能说明什么问题，哪个博物馆收藏了这些文物等。所以你不但要了解本馆藏品，还要了解新发现的文物。在博物馆工作，需要研究历史，需要研究文物，也需要博物馆学，所以博物馆的人才，是一个复合型的。

历史的研究呢，我自己的学法是在整个历史范畴中，选定了一个重点范围，是明朝和清朝，大体上是14世纪到20世纪。在“文化大革命”前，我的研究重点一直在早年困扰我的问题上：中国为什么会落后？在蒙古国没有独立以前，我们中国的地图就是“秋海棠叶”，为什么“秋海棠叶”周边会被蚕食？我就开始将目光放在明朝、清朝来考虑这个问题。我的一个重点是把土地制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结合考虑这些问题。中国封建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是从哪些行业开始的？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总之，我这几十年做的工作里面，一个是花了很多力量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农民战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一个是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状况；还有一个是明清边疆民族问题，我重点研究厄鲁特蒙古和准噶尔问题。后来有个同志与我合写了一本书《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2]。我后面还写了一篇论文《明清西北边疆与准噶尔问题》[3]。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我的研究方法是文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我去苏州调研丝绸业，去湖州调研蚕桑业，去景德镇调研陶瓷业，去佛山调查陶瓷业和冶铁业，后来写了一篇《广东佛山资本主义萌芽的几点探讨》[4]。概括起来，我的研究是从工作需要出发；我的研究方法是在历史的研究上，文献与实地调查或相关文物的结合。所以，这样的研究也只有博物馆里的学者才擅长，也是博物馆工作所需要的。

到了1992年，历博建馆80周年，我写出论文《11到19世纪中叶的中国与世界——三论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5]，这篇着重对原因做了探讨。2012年收入《百年国博纪念学术文集》，改名为《走向复兴的反思：11到19世纪中叶的中国与世界——三论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从最初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到最后写成的这些文章，这是真正核心思想形

成的过程。而我写的这个东西呢，也得益于我在大学时候上的是政治学系，学的社会科学，是这些东西，帮助我做的这些研究。如果我光看古代史，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就难做这方面的研究。

您谈到中国历史三百年大趋势，让人印象深刻，在您的提法里面，类似西方的“全球史”话语，您应该比西方学者早了很多年。新全球史是什么呢，他们认为15世纪以来，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地球村”了，就是贸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6世纪中期以后进入一个全球贸易交往的时代。中国史应该放到全球史里面来看，您比西方学者们提出的全球史视野在时间上更早。您要是写了英文版，这些文章肯定会引起更广泛的讨论。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像田汝康先生也写过文章，比如研究胡椒在全球史里面的作用[6]。

三、博物馆学定位：实证科学

除了历史方面，还有您刚才说的博物馆学研究，也跟您的工作分不开。您主持编写的《中国博物馆学基础》[7]不仅具有理论前瞻性，还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您是如何进行博物馆学研究的呢？

博物馆学的研究，这么说吧，我原来并没有专门研究它，而是在工作中实践。1982年成立中国博物馆学会的时候，我做副理事长，到1984年的时候，理事长是国家文物局孙轶青局长，因他调到全国政协当副秘书长去了，所以我代做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在我做代理事长期间，文物局分配了一个任务，要编文博教材，其中就有一个博物馆学，我责无旁贷。因为当时有兴趣研究博物馆学的人不多，真正有兴趣研究的人，老一代里有宋伯胤，苏东海同志也研究，他是后期才开始研究博物馆学的。我以前也没有写过博物馆的东西，但是我有看法。当时有两个因素刺激我编出这本《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一是好多人不承认博物馆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我觉得如果博物馆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现象，就可以构成研究对象。而如果你确实从事对它的研究，并要探讨它的客观运动形式和规律，按照辩证法来说，就可以建立这个学科。所以，当时我和梁吉生写了一篇关于博物馆学的文章。国家文物局让我来主编这个教材，我找了几个人，有南开大学的梁吉生，我分给他一部分；陈列、藏品还有几部分是我亲自写的；请历博美术组的同志写的美术部分；请工程师写了建筑部分。这样经过一年多写成了初稿，1990年出版。出版以后，找我们要书的人挺多的。这本书也成为大学文博专业的主要教材，陆续印刷了很多次。从1986年到2000年，全国的博物馆从800多个，发展到2000多个了，我大致统计了一下，十多个大学有博物馆学专业，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等。后来，国家文物局提出来让我们做一些修订，到1999年，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请大家认真修订，做了一些更改，原来是十二章，这次修改变成四编二十四章，把它丰富起来，特别加一些信息化等方面的新的内容（具体内容的变化，如表1所示）。

在博物馆研究的过程中，我就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另一个是吸收了外国的成果。

我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个中国博物馆起源的问题。从前看书，西方认为最早的博物馆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后来我去孔府参观，回来一翻《史记》，上面说孔子死后第二年，就以孔子的故居做孔子庙堂，还有许多学生在那里学礼，在东汉时期，更是流行春、秋两季来此祭拜，实际上这是我们最早的纪念馆，也就是纪念馆类型的博物馆。所以我觉得，虽然近代博物馆是西方传入的，但是博物馆的渊源，西方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中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1994年国际博协的国际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开了一次年会，讨论的内容就是博物馆实物资料、社区博物馆的建设等问题，当时我们中国没有社区这个提法，我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孔庙就是中国社区博物馆的渊源。在会议上，各国代表听了也没法提出异议。

另外，在借鉴国际的博物馆经验方面，博物馆管理上的做法，西方流行理事会制度，大部分博

表1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内容变化

1990年版目录	2001年版目录
	序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前言
第一章 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第一编 博物馆学基本理论和博物馆历史** 第一章 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第二章 博物馆学的历史发展 第三章 博物馆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和类型	第四章 博物馆功能与类型
第三章 博物馆历史	第五章 博物馆历史
第四章 当代博物馆事业	第六章 当代博物馆
	第二编 博物馆专业工作
第五章 藏品（上） 第六章 藏品（下）	第七章 藏品征集、鉴定和管理 第八章 藏品计算机管理 第九章 藏品保护
第七章 陈列（上） 第八章 陈列（下）	第十章 陈列研究与设计 第十一章 陈列艺术 第十二章 动态陈列和高新科技运用
第九章 观众	第十三章 博物馆观众 第十四章 博物馆教育与服务
第十章 博物馆科学研究	第十五章 博物的科学研究
	第三编 博物馆管理
第十一章 博物馆管理	第十六章 博物馆管理是多样性系统工程 第十七章 人事、财务、安全的管理与规章制度 第十八章 博物馆自筹资金的考察
第十二章 博物馆建筑	第十九章 博物馆建筑
	第四编 博物馆信息化 第二十章 数据库建设和通用网络平台 第二十一章 标准化和文物知识工程 第二十二章 博物馆建筑智能化 第二十三章 数值化博物馆 第二十四章 博物馆信息化系统工程观念
附录一、博物馆法规	附录一 博物馆法规
附录二、学习参考书目	附录二 学习参考书目
附录三、中国博物馆大事年表（1868—1985）	附录三 中国博物馆事略（1868—1999年）

物馆都不是政府举办，而是利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这是和中国不一样，我们也学习人家。在修订版里，专门增加了一章有关资金筹措的内容，这是我们以前都不太提到的。在博物馆科技与信息化方面，这次新增了一编的内容，共五章，应该说增幅不小了。这部分内容是全新的。

您提到，博物馆学是否是一个独立学科的问题，以及您如何论证它是否是一个独立学科，这些思路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博物馆是不是一个社会现象？如果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现象，那就需要一个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看法与涂尔干以来的实证主义科学是一致的。实证主义思想和理论是社会理论的基石。我不知您有没有读过涂尔干的著作，在博物馆学研究中，我觉得您的这个学术认识与学术自觉是非常重要的。

四、思想火花：博物馆理念升华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已经成了中国博物馆学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上次修订距今已十余载了，您是否有再版的计划呢？

如果有可能，我有个想法和提议，就是以修订版为基础，做《中国博物馆学基础》的第三次修订。要落实这个想法，我碰到好多困难，我的时间已经不多，年龄不饶人，我的精力已经不行了，我和梁吉生先生也商量过几次，当时他的事情也挺多，很多时候也是力不从心了。所以，我倒希望你们年轻人来做，如果愿意的话，我和梁先生商量一下，就抓紧启动。

您今天说出这样的想法，我们很钦佩，也很感动。对我们而言，有机会为第三次修订做哪怕一点点辅助性的工作都是无上的荣誉。

各大学都把它作为教材，继续修订，甚至另外起一个书名都没有关系，把它再进一步丰富。一方面，修订版是2000年完成，2001年出版的，到现在已经12年了；另一方面，世界博物馆和博物馆学的发展，有几个很重要的议题，应该把它补充进来。一个是博物馆的职能的调整，2007年在国际博物馆协会维也纳会议上，修订了《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把研究、教育、欣赏的次序换了一下，改成了教育、研究和欣赏，把教育放到了第一位；另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被提上国际博物馆的议事日程，成为国际共识。从博物馆学角度讲，我们应该支持这一举措还是进一步限制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太广泛了。有些工艺的保护完全可行，丝绸、陶瓷、制茶，我们都有博物馆，这个没问题；但你现在要把天福号酱肉（制作技艺）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他开个博物馆去？他一定有困难，有商业秘密，烹饪配方他不愿意传播出去，即使传播出去，观众怎么欣赏呢？这不是视觉和听觉能够解决的问题，这得用舌头去品尝啊。如何在博物馆的参观过程中加入品尝这一项呢？而且，这个所谓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应该怎么划分，有没有其他条件的限制？什么项目可以列入，什么项目可以建成博物馆，还得研究。

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加入，博物馆会进一步发展，甚至会突破现在博物馆的模式，使现有博物馆发生新的突破和转型。因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到博物馆里面，按现在博物馆的形式有困难；而且现在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独立建办博物馆也有困难。我到土耳其去参观，土耳其的博物馆经常办音乐会；我去看过意大利的斯卡拉大剧院，它有一个戏曲博物馆，它是博物馆和剧院结合的，博物馆在剧院里面，把意大利的歌剧的发展融入进去，过去都有些什么剧目，有些什么著名的演员，那些歌剧的歌词、五线谱，都记录下来，更早的历史没有五线谱，就从三线谱、四线谱开始保留下来。如果按照这个发展形势，那未来某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还应该带着一个剧院呢。舞蹈展出也是，得有个剧场，得有个舞台。现在昆曲是中国的第一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就建议在博物馆展示中弄个录像，弄个大屏幕，把其代表作《牡丹亭》“演”出来，为什么不可以呢？既然都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了；还有古琴，这个我

主张，在展示春秋文化的时候把它放进来，春秋战国时期有古琴，你可以弹《高山流水》嘛，到明代的时候，就放《牡丹亭》。所以在教育、研究、欣赏这三个词中，品尝能不能算欣赏呢？这些问题，都是博物馆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这方面发展了，博物馆就会突破现在这个外壳，比如中国电影博物馆，就附带六个影厅。所以博物馆概念，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纳入，会引起变革，这可能是博物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变革。它不是以往熟知的那个“物”，所以现在不叫“物”，叫“遗产”，将来“文物”局就概括不了了。而这个变革，按照我们这个翻译，博“物”馆，“物”字就难概括了，可按人家的“museum”就不难了，供奉艺术之神的殿堂，那就是文化艺术之宫啊。所以“博物馆”在以后事业的发展和理论上、概念上、实践上，还有许多新的问题探讨。但是突破了这个“物”，博物馆就大大地拓展了它的领地和范围。

您对当下以及未来博物馆发展方向等前沿问题思考得太深刻了，为我们年轻一代树立了典范。与时俱进，学无止境。

关于博物馆学我还有一个看法，是前一个月，《中国文物报》上登了一篇关于“文化遗产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我们博物馆学界、文物考古学界、历史学界也都跟国家文物局讨论过，就是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哪些。这个非常重要，今天仍然没有解决，需要更深入讨论。从我写《中国博物馆学基础》这本书开始，就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博物馆学以及相关的各个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理论，那么博物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应该是什么？前两年，我翻阅欧洲的思想史，我发现了一个社会理论线索即实证主义理论和方法。中国过去没有这个提法，后来我想这个实证主义，是用实际的例证，去解释一些具有一般意义的现象，这个学说就叫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和我们博物馆有什么关系呢？博物馆理论和实证主义有什么关系？1974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给博物馆所下的定义中博物馆的功能是收集、研究、展示，围绕的核心就是“物”证，“物”是博物馆工作的重点和核心，用物证去说明问题，它的理论当然就是实证主义。博物馆凭借的就是人类和客观世界互动形成的种种物证，也就是文化遗产，用文化遗产来进行教育，进行研究，实证主义就是博物馆的思想工具、逻辑工具。我们向博物馆学界提出新的问题，这就是实证主义。我的这些思考成果只有一部分反映在了《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一书中，主要的部分需要单独成文。

关于实证主义理论与博物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确太重要了。感谢您毫无保留地分享这些重要的学术发现和理论思考，这次访谈让我们受益匪浅，非常惊喜。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害怕这种“刨根问底式”的访谈，给您带来过度的疲劳。今天的访谈先进行到这里，我们还意犹未尽，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与您展开深入探讨，但您对博物馆工作的理解、博物馆学的理解，思想之深入、超前使我们赞叹，谢谢您。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恢复“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建制的批复[R]. 1983-01-31.
[2] 王宏钧, 刘如仲. 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4.
[3] 王宏钧. 明清西北边疆与准噶尔问题[M]//王宏钧. 秋海棠叶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4] 王宏钧, 刘如仲. 广东佛山资本主义萌芽的几点探讨[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80: 68-79.
[5] 王宏钧. 11到19世纪中叶的中国与世界——三论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M]//王宏钧. 秋海棠叶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6] 田汝康. 郑和海外航行与胡椒运销[M]//田汝康. 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7] 王宏钧.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